

## 王翠玉访谈内容

我出生在浙江宁波一个城市平民的家庭，六岁的时候，母亲就去世了，家境非常困难。

( 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？ )

家里，当时在的时候，有四个，但是，一个大姐一直从小在外婆家里长大，不在一起，还有两个哥哥，一个姐姐。不久，我的二姐生肺病死了。我小的时候也得过肺病，但是，她死了。还有一个大哥，在日本人的时候，被日本人作为八路枪杀了。当时后来，母亲死了以后，家里只剩下我和二哥两个人。父亲在这样孤独的情况下，靠做一些小生意，以后就娶一个继母。我们宁波当时就象中国封建一样...封建思想是很厉害的。由于我们家在一两年的时间里，死了母亲，死了哥哥，死了二姐，结果当时我小时候很大的一个罪名就是在我们家里是“白虎星”，由于是我的存在，使家里发生了这一系列不幸的事情。这种思想虽然出自于我的继母，但它代表了一种封建的礼教。因此，我小的时候是非常苦的。我四岁的时候，当时我家里是做香烟的，我当时就在凳子的凳子的上面做香烟，一天做到晚。我做得非常快，我没有童年，没有玩耍，所以，我从小不会玩，只有做。以后，父亲生意不行了，我还进了一个生产厂，去做童工。

以后，我大姐从外地回来了，在抗战胜利以后，她从小是在外婆家长大的。

( 外婆家在什么地方？ )

外婆家也在宁波.她当时读了小学以后 ,到外面读了一个体育学校 ,以后又读了护士学校 , 她做了助产士。她知道母亲死了 , 她的大弟死了 , 她的大妹死了 , 她想回去看看从小养她的外祖母。她一看到我一身的憔悴 , 很苦 , 很受压迫的痛苦的景象 , 结果 , 她向父亲提出 , 她要带我出来 , 让我读书。

( 那是你几岁？ )

47 年吧。

( 你小时候没有读过一天书？ )

没有读过。她看到我没有读过一天书 , 又受到我家里、厂里受到的双重压迫 , 她说 : "我现在已经工作了 , 我来养妹妹"。她就把我带出来了。她也没有家 , 她走到哪里 , 我就跟到哪里。有的时候寄放在她朋友家里 , 一边开始读书 , 一边给人家领孩子。

( 大姐比你大几岁？ )

大 15 岁。

( 她那个时候已经有 20 几岁了？ )

哎。是这样的。过了几年之后，在二姐身边，就这样，我读了二、三年的书。我是跳级读了，没有从一年级开始读起，从三年级读起，读到五年级的时候，当时在南京就已经解放了。

解放的时候是在南京。这样，我开始就有了文化，当时我读书也是读得很好的。到我小学快毕业的时候，南京解放了，南京解放了。当时我所在的小学时，有从交大过去的...学生运动过去的大学生，他们来宣传共产党，宣传解放，当时自己非常欢欣鼓舞。当时我就想：我今后一定要好好读书。

当时又碰到一个问题，姐姐结婚了。她有了第一个孩子，姐姐又把当学徒的弟弟，我的二哥，也带在身边。

( 你们兄妹是不是同年出来的？ )

不是同年，他在后面，我先出来，他是 48 年，解放前夕出来的。当时姐姐看他在在上海做学徒太苦，他在上海做糖，那个锅子烧得非常热，这样当学徒非常苦。当时，她感觉到自己工作了几年，经济上也可以，不但把我带出来，也把哥哥也带出来。她跟姐夫谈恋爱的时候，就提出了一个条件：你跟我要结婚，我要照顾好弟妹。我姐夫也是同意的。

( 姐夫是怎样一个人？ )

他也是可以的，是一个富家子弟，解放前夕，48年的时候，也到美国去留学，他是学医的，人是非常好的。解放前夕，他从美国回来，跟姐姐结婚了。到解放那一年，已经有了一个孩子。你想，一个美国留学生，跟我姐姐这么一个助产士，自己又有了孩子，又要带两个弟妹，可想而知，生活负担是非常重的。在这样两个选择过程中，我的姐夫，一男一女当中，他当然情愿负责一个男孩。他当时对我说：反正已经解放了，文工团什么的到处都有，你好去参加工作了。我姐姐不知道这个事，我听了以后，我感觉到有点伤心。我当时正是读书的时候，我尽管对解放欢欣鼓舞，但我还不想去参加文工团，我还想读书。后来，我就跟我的老师谈了这个事情。我跟老师谈了我从小的经历：我为什么要靠姐夫的？我现在面临着什么问题？当时有一个叫王浩的老师，他原来在陶行知育才学校呆过的。他说：这样吧，我把你介绍到上海，一个陶行知办的育才学校，这个地方专门收孤儿的，你就到那边去读书。他说，那里吃饭、读书、穿衣都不要钱，可以勤工俭学，一边读书，一边劳动。我听了以后非常高兴，就对姐姐说：老师介绍我一所学校在上海，读书什么的都不要钱，你们现在负担也很重。当时，姐姐不肯，但我坚决要去。结果，她后来把我送到火车站，对我讲了一句话：你翅膀硬了，要自己飞了。她心里也非常伤心，她说原来想准备要把我从小学培养到中学，然后到大学，你现在要离开我。当时，我是不会向她讲姐夫的事。因为我觉得我虽然听了有点伤心，但我能够理解他，不能向姐姐讲这个话。于是，我一个人到了上海，进了育才学校。到了育才学校，因为当时刚刚解放，天时地利条件是非常好。陶行知虽然当时已经死了...但在学校里是以大哥大姐称呼的。男老师称大哥，女老师称大姐，这样造成一个家庭的氛围。学校里的学生大多数是孤儿，少数家庭富裕一点的，就交一点学费。我是甲级生，什么都是免费的。实际上是过

去当时在国外有联系的一些捐款人，把我的照片寄过去，国外就有一些资助。这是后来我长大以后，特别是办了平民学校，我自己搞了以后才知道的。当时在学校里，吃得很差，育才学校是从重庆搬过来的，很多是四川人、重庆人，都吃辣椒，每天都是卷心菜、辣椒，结果屁股上都发疮。

( 就是上火了？ )

上火，就这样，吃这样的饭菜，每天一边读书，一边劳动，当时有田地种的。

( 当时学校规模有多大？有多少学生？ )

大概 100 多人。当时过得非常愉快，我们还到农村去当小先生。陶行知提倡“小先生”，我还帮农民去识字什么的。因此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自己无忧无虑，爱满天下。的确受到了一种亲情的教育，一种爱的教育。另外，因为育才学校一直是党的民主堡垒，因此，民主思想、党的这种革命理想教育对我影响很深刻。因此，在育才学校一年多的时间里，我是 49 年进去，将近两年时间，对我人生奠定了很好的基础，我觉得，我是彻底地觉得自己第一次解放了。我觉得我的个性得到了彻底的释放，无忧无虑，没有任何精神上的压抑，尽管生活上很艰苦，我觉得...独立性非常强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。

正是因为这样一个思想基础，当 50 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，由于我非常热爱新生的政权，非常爱新中国，所以，当时抗美援朝一开始，学生当中有参干运动，“12·9 运动”，1950 年“12·9”，就发动学生参加军事干部学校，到朝鲜去。在这个运

动中，我突然觉得自己不能因为要读书，再呆在学校里了。当时姐夫叫我不读书，我跑到育才去。现在我为了保家卫国，为了新生的政权，为了新中国，我是第一个上台去表态。我说：我非常热爱读书，而且，我当时作文也比较好，当时许多世界名著都看了，如《悲惨世界》等，都是那个时候看的。我非常喜欢文学，我本来想今后当个女作家。但是现在祖国受到这样大的危险，我决定不读书了。我想在战火中锻炼自己，在实际的革命洗礼中将来来写作，将来去做作家。当然，当时跑上去的时候，我还摔了一跤。

由于可能我在这个运动中表现很突出，我的确是出于内心的一种保家卫国的情感，所以，最后没有让我到干部学校，如果去了话，就要到朝鲜战场去了。因为这个运动是团市委大昌区团委团工委组织的，大昌也就是现在的宝山，当时的育才学校是在宝山(大昌)的。这样，大昌区团委看到我的表现--特别是跑到台上去摔了一跤，最后发言，我怎么到上海来读书，就把我留下来的。我成为团区委的第一批团干部。

( 就是共青团？ )

我在学校就加入共青团了。

( 是在哪一年？ )

49年。尽管年龄不到，但是，因为是第一批建团，我是第一批。我是团员，

表现又特别突出，我就在大昌区团委做地方工作，当时正好要开始土改，民主建政，于是，我就到了农村搞土改，搞民主建政。以后，我又从团区委调到市郊团委，就是上海市郊区团委，都是联系农村的。再接下来，到了大概 54 年，郊区团委撤消以后，我们就分兵几路，我就跟后来成为我爱人的他一起调到了团市委，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，我从团市委调到了市妇联。

(是哪一年到妇联的?)

1978 年。

(到团市委是哪一年?)

54 年。

那么，我从 54 年到团市委，然后，正式离开是 78 年。中间有八年半"四个面向"到基层去当教师。我觉得那些年，是共青团干部，在青年人的队伍里，大家都很有朝气，自己发展也很顺利，不管是做农村工作，还是做学生工作。而且在团市委工作中，认识了青梅竹马的...我的爱人叶祖康，我们一起 18 岁入党，以后谈了五、六年的恋爱，然后到 59 年我们就结婚了，接着有了孩子。我自己感觉到，事业、家庭、爱情都感觉到很幸福，别人都说我们是幸福的一对。他也很有才华。

文化大革命前夕，我从中央团校学习以后，就在团校搞教学理论的研究，搞青年教育。尽管那个时候，我也受冲击，但是大面积的，大家都是一样的，自己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特别的。当时老干部都受委屈了，我自己又比较年轻，什么牵挂也没有，弄到后来也就谅解了。

但粉碎四人帮以后，到了妇联以后，出现了两个情况，促使我后来对女性主义问题...萌发出来了。

(就是女性主义思想?)

怎么回事呢？我到妇联以后，可能是团市委的介绍还是别的什么，反正当时妇联给我的担子是很重的，要我去开辟上海市科教文卫的高级女知识分子的工作。因此，在高校、文艺团体、科学院建立妇女组织，开展知识分子工作。这样我就觉得自己到了一个精彩的世界里，看到女科学家、女教授、女演员、包括体育界，当时的一些名流我都认识了，接触了。我深深地感觉到，我们中国的女性人才济济。象张蓉芳、秦怡呀，就是那个时候认识了。我自己也很受鼓舞。但在工作过程中，我又感觉到她们成长不容易。她们到了尖锋上的人...跟中层的相比，她们是少数，多数女性是上不来的。他们少数人上去了，上来得也不容易，很艰难，也是过五关斩六将上来的。但是，大量的中间女性人才，女科研人员，女演员，要上去是非常难的。平时大量的工作都是女同志在做，但是到了评奖了、评职称了，一男一女在一起，必然是男的上去的。因此，到了这个关键时刻，女同志就会下来，只能是中等水平。因此，做辅助工作的多，真正骨干的少；中层的多，拔尖的少。我开始还没有受国际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，理论还没有。我就感觉到男女要平等的思想--毛泽



东时代早就提了.我当时就采取了几个措施：第一个措施，在科教文卫系统年年评“三八红旗手”.劳动模范当不了，先进当不了，先进工作者当不了，因为是男女一起评的，但“三八红旗手”是女的专利，如果市妇联市一级名额有限，但各个单位、各系统可以自己评嘛！年年评.我们妇联二三年评一次.这样就搞“闪光点”，把她们亮出来.当时搞得非常红火.科教文卫系统是上海第一家开辟的，介绍经验也是上海开始的.基础工作实际上就是我在做的--我兵都没有的，我既是科长，又是干事,一个人到处跑,搞得满欢的。同时，又提出了一个口号“拨开尘土，挖掘明珠”.意思说：我们很多女性都在默默无闻地工作，但是她们都有闪光点，很多人才被埋没了，我们妇女组织就是做一个“拨开尘土”的工作.不是说去造就人才，因为妇女组织不可能去造就人才，它是一个群众组织.在女性的成长过程中，不管是评比“三八红旗手”也好，向领导反映某个人才也好，这就是你在发掘人才。那么一个形象化的说法，就是“拨开尘土”，她们往往是被尘土压在里面，你把它拨开。这个工作我们做得非常出色的，一起挖掘人才.除了评先进以外，大家年年来搞“我身边的闪光点”。就是来谈我身边的女同志的先进、“闪光点”，这样大家都互相发扬先进。这样，或多或少地是争取一点平等的权利。有些人,后来人大上海的(领导)...这些原来都是“红旗手”上去的.这是一件事情。

第二件事情就是 85 年以后，妇联可能是把我提拔一下.叫我去搞干校，去建第一所妇女干部学校。我们妇联过去没有妇女干部学校，是我 85 年去创建的，我是第一任校长。我去筹建了妇干校，建立以后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建立“女性人才学”这门课程。每一个妇女干部去培训的第一课，必须上这个课。当时这个教材没有. 叶宗海，华东师大的叶宗海就和我一起发起“女性人才研究会”. 他当时

还是一个书稿，还是一个初稿，当时还没有电脑，是手写的，这样一个手稿。他送给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，但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说一定要 2000 本的订单，我才能给你出版。我正要上这个课，我就把他的那个书稿拿来，校印一下，在学员当中的第一期开始就上了。上了以后，当然效果很好。

( 当时那个学校办起来的时候，有多少学生？ )

当时因为校舍都没有，我第一个班就是在芭蕾舞学校借了一个地方，50、60 个人，以后就有第二班。到最后，因为妇干校跟一般学校不一样嘛，它是干部培训性质，每年有几百人，总是这样一个规模。这样一下有了效果以后，那么，她们这些妇女干部学校的，有些都是区妇联主席什么的，回去也要去上，这样就要书了。我就一下子征订了 2000 本。当然有些人说：你发神经病呀？弄那么多钱，当时妇干校又没有什么钱。结果，他这本书也就出版了。

( 你当时这 2000 本书的经费从哪里来呢？ )

当时国家一年有拨款 13 万元，包括房租、工资等，是从这里的钱省出来的。

( 妇联给的钱拨出来的？ )

这是国家拨款，因为我妇干校建立以后，我申请了一年财政拨款经费也是 13 万，到现在为止她们还是这个 13 万。

( 这么多年了? )

哎！靠这个发工资么，房租等等，就这些.包妇联不会拨款的。这是当时(我做的)第二件事情。

当时我做的三件事就是...第一，年年评比“三八红旗手”；第二，“拨开尘土，挖掘明珠”；第三，建立女性人才学课程。那么，这是面的工作。我觉得，我在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，特别是 85 年以后，我萌发的女性主义思想，除了工作上接触实际--觉得女性成才很不容易，女性在社会进步当中的起跑线等各个方面都不公平，不公平，她的标准以及她的超负的程度都不公平以外--还有就是我自身的原因。当时，83 年，我爱人得了肺癌死了。当时留下一个刚刚进大学的大孩子--我有两个儿子，还有一个刚刚小学毕业的小儿子。我一个人带着一个大学生，一个中学生，又要我挑起一个筹建从零开始的妇干校，你想 83 年，我是 84 年叫我去筹建妇干校的。

所以，当时我有什么感觉呢？人生三大不幸，我童年丧母，当时受到封建礼教的“白虎星”这些东西的压迫，正是因为这样，我当时向往解放，追求解放。记得在六十年代，我当时看《红色娘子家》电影的时候，我简直是泪流满面，我觉得好象电影里人物的事情都好象是我经历过的。我当时刚到团市委工作，心灵上的沧桑似乎磨平了。当时人生的第二件大事...不幸就是中年丧夫。我当时经历着不幸，我尽管当时在妇联机关，实际上在我们妇联机关本身,在我们女性当中，一种潜在的封建的东西还是有的。一个(表现)就是我不能在机关时提为处

级干部，而是要我孤儿寡母从零开始去筹建妇干校？我当时孤家寡人，带着两个孩子，我在上海还没有任何亲戚。还要从零开设，没有一寸土，没有一间房，没有一个人，从零开始去开辟一个妇干校。我当时在芭蕾舞学校借了一个地方办学，那是在一个农村的地方。当时正在演《阿信》电影，我每天都陪着学员在看电影，那个时候，我的大儿子在大学里住读，我小儿子一个人在家里，没有人照顾他。我心里感到非常着急，非常想念他，但我没有任何办法。为什么这样一来呢？应该说我是没有能力、也没有理由去担这个担子的，我毕竟是势单力薄。我当时第一次感觉到了孤儿寡母，受到了歧视、被冷落，缺少一种关心。

我就感觉到，当时在这种情况下，在女性当中，往往一种潜在的东西，比如说，她没有丈夫啊，一方面也有很多同情，但是实际上也潜伏着一种你没有力量、没有依靠。而且常常还会有这样一种理论：你老王你太不管家，一天到晚工作、工作，才会有这样一种结果。后来有领导对我说：如果你要照顾丈夫，还有两个孩子，你长期请假也可以，我们会照顾你的。听了这个话以后，我就感觉到非常的刺激。这个时候，我最需要的就是要振奋，我不能退却。但是我到了人财两空，你还要争什么强？你去照顾家里好了。在丈夫死了以后，别人说：好了，你也快到50岁了，(我们是同岁，都是48,49岁)你就去照顾照顾孩子就行了，提前退休等等。这时候，我就觉得，小时候作为孤儿被别人看不起，甚至把女孩当作一种灾难的根源，到了中年，中年丧夫了，就感觉你自己没有把家里弄好，你提前退休就好了。这种滋味是很不好受的。一方面，在丈夫生病的时候，我尽最大努力，我工作不放弃，但是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让他拖长生命的时间。本来医生说只有三个月，结果我让他拖了三个年头。在这三年里，我白天上班，晚上照顾他，开始在家里后来在医院里，我晚上睡在那里，家里的小孩只有临时请了一个

人帮我一下。白天请阿姨,我上班她来照顾孩子。我们两个人。经济上我有困难,我哥哥姐姐也支持我。就这样拖了三年,我坚决不请假。我说: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,我退下去,一方面我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来照顾他,如果他真的走了,我也无法支撑这个家。他走了以后,更有一种说法:你也快 50 岁了,提前退休照顾照顾孩子,以后你靠他们就好了。我想,重要的是我在事业上要有发展,他们在学业上要有所进步,我们只能在贫困中去成功、成才。我觉得,教育孩子最好的方法,就是以自己的行动去潜移默化地带动。丈夫走了以后,我一个人带着孩子。我对他们说:你们好好学习,妈妈好好工作。我包了全部的家务,有时候做家务做到晚上二、三点钟,我不让孩子洗一个碗。大孩子大学毕业,他工作以后,再培养第二个孩子上大学。我就感觉到,科教文卫女知识分子成才的艰难以及我自己的挫折,我觉得女性要真正走向成功、成才,如果没有一种先进理念,在这种情况下,往往自己也就趴下去了。

我为什么要在妇干校建立女性人才学课程,那个时候也是我最困难的时候,这是有道理的。到了 88 年以后,我开始酝酿成立中国女性人才研究会,我也是因为考虑到:象我这种情况,女同志在她的一生中,前进的道路上总归是坎坎坷坷的,要爬过一个又一个山头。那时如果没有一种自己求解放、自强的精神的话,是没有办法经过这种坎坷的。因此 88 年以后,我当时就跟叶宗海商量,能不能以女性人才学理论为基础,发起成立...当时的中国人才研究会,下面有农民人才研究会,文艺人才研究会等,那么我们就建立一个女性人才研究会.这样提出报告,在六四以后批下来了。1989 年 12 月,我们就在浙江镇海,把中国女性人才研究会成立起来。这个时候我除了觉得女性要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不断地奋起,要有自强、自主意识以外,还有一个理论,对我也是有影响的,当时从日本过来有一

个“三个学习一万年”的理论。

( 什么意思 ? )

就是“人生有三个一万年”的学习论。0——29 岁为一万年，以学习为主，是一辈子打基础的时候；29——59 岁，是第二个一万年，你在工作，是社会的中坚，你要不断地发展的话，你一定要坚持学习，只有坚持学习，你才能把第二阶段发展得很好，不断地攀向高峰，成功、成才；第三个一万年就是 54 岁以后到 81 岁以后，是一个人正好是一辈子积累了经验最丰富，是一个人一生中拖累最少，但是又是你积累了一辈子的经验和才学，是腾飞升华的第三个一万年。这个理论，当时对我鼓舞很大。因为当时我发起这个的时候，我已经快退休了。当时处级干部还没到 60 岁，我是 90 年到 55 岁。我在退休前两年就开始准备了。有些人问我：你干什么呢？过去老是工作工作，要你休息照顾家你也不照顾，你总算现在硬撑过来，把两个孩子培养成大学生了--一个已经工作了，一个大二--你已经很不容易了。现在你快退休了，你还要去干？当时，这个理论对我鼓舞很大，我觉得中国最大的浪费就是人力资源。现在女同志到 40 岁就退了。人一辈子没有多长时间在工作，在体现价值。在人没有老的时候，你已经感觉自己老了。当时还没有 45 岁退休的。我退休时处级到 60 岁。我就用人才学的理论，终身发展“三个一万年”的理论来发动全国的姐妹们，大家自筹资金，集合起来成立全国女性人才研究会。所以，这个研究会成立的思想基础是很纯的，就是为了研究女性人才的理论，引导大家成才。还有，作为我自己来说，我不断地宣传“三个一万年”的理论，你们不要怕自己在职不在职、退休不退休，这都是人为的。现在西方到 75 岁退休的人还大有人在，那不是人为的吗？你为什么承认这个命运呢？

当时是 95 年的世妇会。中国女性人才研究会想办的一件大事就是：在毫无

背景，毫无资金来源的情况下，我当时是秘书长，就让我筹备组织代表团。经过一年筹备，95年真的到了怀柔去参加了世妇会，中国有42个论坛，当中唯一的民间组织完全靠自筹资金。当时是怎么自筹资金呢？我们当中的女企业家代表自己出资一点，向全国妇联申请，批准以后，也给了我们一点经费，当时筹集了十多万元，办成了这件大事。当时我们就叫“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女性人才研究会”，挂靠在国家计委下面，以前是挂靠有国家人事部的，那时我们做得是非常成功的。世妇会以后，我们又连续不断地有大的举措。在重庆搞了“西部女性人才发展研讨会”；去年，在江西搞了“城市化与妇女发展研讨会”，各个群体、各个层次的人...我们研究会中的骨干有年轻的，在30—40岁。

(她们来自哪些地方?)

江西、陕西、黑龙江、内蒙古、重庆、四川、辽宁、江苏等。

(都有分会一样。)

对，这些地方都有分会，他们现在已经成为省的一级学会了。研究会中，老、中、青都有。老的，70多岁的也大有人在；年轻的二、三十岁，会场里活跃得不得了。老的的确学术上都是很有研究，而且几十年如一日，一直为女性人才发展研究。我们研究会都是与实际问题联系在一起研讨的。我觉得研究会成立以后，一个是针对不同时期的形势的发展。(比如)我们曾经在上海还搞过一个“新时期女性人才发展高级研修班”。

(象这种全国性的大型研讨会，你们这个研究会一般多少时间举办一次?)

一年半左右。这是有一个过程的，太短不成熟。第二年举办，时间上来不及，因为我们都是不脱产的，没有专职干部，这是作为一个社会工作来做。

95年世界妇女大会以后...这是在9月份，但是就在同年的6月份，我成立了"女子平民学校"。

(全名叫"女子实验函授学校".)

这个事情要交叉在讲。当时我在全国各地到处跑。这个世界真精彩,但觉得高层次女性人才成才不易。在跑的过程中，我就发现，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巨大地发展，国家富强了，人民也富裕了。但在到处跑了以后就发现，我逐步形成了一个理念，就是“三大差异”。一个是地域的差异，比如从上海到内蒙古，真是不好比。在上海，即使是上海的下岗女工，也是住在高楼大厦里，但在内蒙古住在泥房子里的人大有人在。还有“人群的差异”。改革开放后，有一部分人富是好事，但是富的人是越来越富，穷的人是越来越穷，两极分化。现在中央重视弱势群体--“农村真穷，农民真苦，农业真糟”。但在90年代初，我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是没有人讲这个话的。但是我可能是从平民家中来，我强烈地感觉到在那些地方的人日子怎么过？特别是有一次在93年，我在山西太原开会，开完会以后，当地的女性组织我们代表到五台山去参观。那一天不是星期天，我看见五台山下一个小女孩，她一边做小买卖，一边在看书。我就问她：今天不是星期天，你怎么不到学校去上学，在这里看书做买卖？她就告诉我：家里经济困难，辍学了。但是她说我非常向往学习，非常向往学校！当时我听了以后，突然之间就想起了我自己当时去育才学校读书的事情。我当时也不是因为孤儿,家庭等种种原因去的吗？我当时就觉得，陶行知平民学校没有过时嘛！我何不弄一个女子平民学校，



让这些孩子在她参加劳动赚钱之余(有机会读书呢!)这个小女孩，一边读书一边做些小生意，来养家糊口，同时还能坚持学习。

我看了以后，心里感到很酸，我就想到了自己的少年，我觉得陶行知那种思想--“捧着一颗心来，不带半根草去，爱满天下”的思想--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要继续发扬。我是一个从陶行知育才学校出来的平民学生，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层面上了，我觉得就应该去做这件事情。于是，我回到上海以后，鼓足勇气，跑到当时的上海教育局(现在的教委)"社会力量办公室".我自报家门，我想申请办一个女子平民学校，名字叫“女子实验函授学校”.当时没想它成为学院.我说,我现在什么也没有--开门见山--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寸土，没有一分钱.但我说我可能有一个优势，我原来是陶行知育才学校的学生，我受过陶行知平民教育的熏陶.我现在全国在各地跑，现在存在着三大不平衡，当时还没有人提三个不平等，也不是说我理论水平有多少高，现在中央都提这个,就谈了这个小女孩的事情.我说我可以搞一个函授学校，这是不需要校宿的.我通过《少女》杂志，这个杂志是上海办的，它一个月才需要一元钱一期，因为它便宜，但它办得非常好，(现在没有以前好了,)它可以发行到穷乡僻壤，发行量有 22 万册。当时杂志社有一个编辑陈丽丽介绍说，它发行到许多的中小城市，连接到农村，这是一个通俗读物，一传十十传百.少女们非常喜欢这个杂志.我说人家已经同意免费为我刊登广告。我就通过这个杂志去招生.他们问我教材从哪里来.我说教材就是人民出版社<少女>这个编辑编的一本《少女写作》，整个一年的教材有十讲，两个月一讲,只要四百块钱。另外我通过纺织大学的一个教授，编了《服装设计与裁剪》，教材也有了。还通过华商美校搞了《营销》，这个教材也写得非常好。这样就有了三个专业，教材也有了。但是人没有，只有我一个人.我说但我还是妇干校校长，现在还返

聘在妇联学会办公室工作，我在妇女界有广泛的联系，我又是女性人才研究会的发起人，办女校有优势；而这又是一个函授学校，面向全国，重点不是在上海。为什么重点不放在上海呢？因为我是妇干校校长，上海已经有一个妇干校，就没有必要重复了。在开始的几年里，学生主要是外面的，她们报名了以后，我就把教材寄过去，学习了以后，做作业，我请上海高级教师，比如说，《文学报道》的编辑部主任等来批文学作业。

（所有的教材都是免费给她们的？）

是这样的：当时我没有钱，开始的时候，一年收她们 50 元钱，但来信中反映困难的，我是全免费的，达到 30% 以上。这样开始的。有一件事对我印象非常深，有一个从贵州到广东去打工的打工妹。那时（教材费）已经 70 元钱了，她当时用打工赚来的钱，包了三门课，寄了 210 元，她说：你们这种教学的形式和教材的水平，老师批改作业的水平，使我在打工之余的间歇时候包括回乡务农都可以学习。有些人语文学得好，被公司录取的人也有，有的有文章发表了；有些人学习了裁缝，开了店；有些人去做推销员。当时的效果是这样的。这个打工妹当时只有 19 岁，头发长长的。她说：为什么我不要你们免费，我只求你们给我知识。我知道只要有知识，才能彻底改变我打工妹的命运。她说其实我是一个兴趣非常广泛的人，喜欢唱歌、跳舞、绘画、服装制作，我将来如果学好了，有多种才能，我自己会去开拓。结果，就在第一批教材寄过去以后，而且我们决定只收她一门课的钱的时候，把其它钱退给她的时候，就收到她同伴的一封信。那年广州梅山一场大水把她冲走了。信里说：我把这个噩耗告诉你们，她只完成了第一批作业还放在她的寝室里，这批作业我们把它留下来作为永久的纪念。另外又说，你们

能不能把所有的教材都寄过来.后来,我把所有的教材都寄过去了.我写了一首诗,让她的同伴把它作为一个悼词都一起烧了(给她作为纪念)。她叫罗雪莲.我说:你是抱着理想和憧憬走完了你 19 岁的岁月,你从农村到纺织厂的女工,从农村到城市去打工,也是为了追求你的理想,而你现在走了,但永远没有死,你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。这首诗一直压在我桌子的玻璃下.我跟陈英老师我的助手说:看了这个东西,我们现在再困难--因为确实是非常困难,我们的规模发展越来越大--再困难我们也一定要做下去。那时我在妇联工作,陈英在工大的专职干部,我们俩人都是利用业余时间,我们收来的一点学费都用于教师批改作业的劳务费,一本作业批改费只有 5 块钱。

( 这些老师也是尽义务的? )

是的.我的学生中有 20%—30%的人都是免费的。我觉得从她们身上这种精神就是一种女性主义:女性要强,女性要自己奋斗。后来我们编的《新芽》,编辑起来再发给学员--因为是函授,不可能面对面地去讲--激励我的这些学员要学习学习再学习,坚持坚持再坚持。到 98 年以年,我的工作重点又从全国转向到了上海开展。为什么要在上海开展呢?我以前有一个宗旨,就是上海已经有一个妇干校了,不在上海开展工作.当时学会设在妇联办公室里,后来听到许多自杀的事情,第一例女工自杀的事件对我震动很大。这位女工下岗了,结果丈夫又跟她离婚了,孩子判给她了,她在双重打击下,在一天早晨,她到菜场里买了一些青菜皮,给她孩子做了一碗青菜面,孩子上学去了,她在家里上吊死了。这件事情对我来说,感到非常的痛苦和惭愧,我为什么要舍近求远?上海有那么多下岗女工,越来越多,如果她们到我的学校来,能够真的受到我们的教育,我相信她

们能看到希望。眼前只是暂时的，一走出去就是一片天。我就跟陈英说，我们回来吧！我们从上海到全国，再从全国回到上海，我们还是要把面授与函授结合起来。于是我们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教学点，主要是面对下岗女工的。在外面，我又到内蒙古的赤峰，最贫困的地方，建立了函授教学点，搞农业技术培训。农业技术培训搞函授是没有办法的，不能批改的，因为天时地理条件不一样的，老师没有办法批的。我们就在那边开了农业技术课，自己编教材，大批教材过去。在内蒙古已经连续四年都有 500 多学员接受培训。

（都是妇女？）

是的。经费从女子平民教学基金过去。

（平民教育基金由什么组成？）

我从上海到内蒙赤峰教学点，又到江西永修这些革命老区，重点在这两个省份。本来还想到云南，我实在是力不从心了，经费不够。一个是上海下岗女工的培训，向政府争取了一点经费--因为后来下岗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，政府也没有办法；另外，向上海慈善基金会包括香港汇丰银行申请了一点；再向全球妇女基金会曾经申请过一笔费用；还有就是我们自己的积累。当时学校创办的时候，是我自己出了一万元，还有两位世妇会代表，她们是企业家，她们都各自出了一万元。三个人三万块钱，就由这些钱作为基数。平时我这个学校不养人、不养房子，哪里有学员就到哪里去办，临时借一个教室，费用是有限的。再有这些教学点都是滚动式的，都不是固定几个地方。因为这些困难的女性，不可能集中在一个地方，再说上海的交通费，最多的时候，我一天都要用 20—30 元钱，下岗女工怎

么可能集中在一个地方?只能是我们到处跑。到现在为止,我们学校都没有固定的房子,现在在城皇庙有一个 300 多平方米的房子,是一个民营企业家看看我们实在是太苦恼了,是一个破房子下面的一个地面借给我们用的.这个房子外面下大雨,里面下小雨,在黄梅天的时候,里面都是发霉的,也没有通风的,天热的时候也很闷,三个教室,也只能凑合着用,但总比没有地方好。这样,不养房子,我就可以用全部的经费来补贴上海的下岗女工.

她们费用尽管有,但是不够的。特别是这两年,我自己开辟了家庭编织加工业。我通过各种专业培训以后发现,就业率很低,而且不稳定,你怎么来弥补这个不足呢?我觉得女同志搞编织,她们可以利用间隙的时间,不出家门就可以进行家庭加工业。从 2000 年开始,经过三年时间,从这个专业的建立到培训再到现在组织合作社,现在已经搞得很热闹了.当黄沙岛这个地方我就培训了 70 多人,第一年平均每个人增加收入是 800 元,第二年增加到 1200 元,今年就不得了了,这一、二个月有很多人已经增加收入千余元。怎么回事呢?技术越来越好,加工的任务越来越多.以前加工一件衣服 5 毛钱、1 元钱,现在呢?几十元一件。我们在宝山通河街道有一个合作社,黄沙岛合作社,她们都是上海的农民,还有就是平阳街道单亲制衣合作社,现在她们都是自己开发市场,自己承接任务,她们都是我们培训的学员。开始,劳动局建立的专业里面没有这个专业的,以后他们看到这是一个非正规就业很好的渠道,就把我们列入其中,也拨了一点经费给我们,我们现在也成为 4050 工程的培训基地。这次我们开展“上海万人外来嫂培训”,是慈善基金会搞的.他们知道我们有这个专业,很适合开展家庭加工业,结果在全市选了 12 个点,我们是其中的一个。我们现在正在培训 400—500 名外来嫂,她们原来是在上海打工的,后来成为上海媳妇了,但她们都没有工作。

自从这样，每次的第一课都是由我来上的，第一课基本的内容，一个是讲办学的宗旨。我宣传一点，就是教育产业化是一个非常时髦的话，但我们这个学校不搞教学产业化，我们是不赚钱的，我们靠自己的积累以及几个申请的渠道我都会跟我的学员们讲，申请来的经费都用于你们的培训，希望你们要珍惜；第二个集中讲女性只有实际的本领，你才能取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，你不要承认自己是优胜劣汰，你们不是劣，你们是社会结构调整过程中，为国家做出牺牲的。只要你们现在好好学习，从头再来，你们将来会发展得更好；第三个就是讲，经济独立永远是女性取得自己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。特别是对外来嫂来说，你们不要以为自己嫁了一个上海的老公，你就可以安定下来了，有些人为什么老是受欺负，就是因为你没有经济来源。有些人尽管丈夫、公婆对你很好，但归根结底，你今后在家里永远是一个没有收入来源的人，不可能有很高的家庭地位，在社会上更不用说了，你成不了一个真正的社会公民，因为你没有参加社会劳动，没有对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。我讲了这些给学员，学员对学校很有感情。

我为什么要同时做平民女子学校和组织合作社呢？人家说：你搞平民教育不赚钱，还自己去贴钱？我跟陈英老师两个人，从年初一忙到年三十，从星期一忙到星期日，没有假日，晚上时间也搭进去了，很累很累……。现在又去组织合作社，是什么道理呢？我感到，经过这几年的培训，我觉得，女性不作为一个团队去组织起来，走集体发展的道路，她是势单力薄的。而且我还想培养学员的一种品性，就是你自己要发展，自己要摆脱贫困，你还要牵着姐妹的手一起来共同富裕。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到北京去，通过冰心的女儿吴青介绍，认识了中国国际工合组织，这个组织也是 1937 年成立，由我们党领导的组织，它在抗日的时候主要也是针对贫困群体的，通过组织合作社来解决贫困问题，以及解决抗日战争时

期的一些物资问题。它的宗旨就是：努力干，一起干，团结合作，共同富裕。我就把工合组织的人请到了上海，给学员进行了合作社精神的培训班。从此以后，我就组织学员，走一条“努力干，一起干，团结合作，共同富裕”的道路，姐妹们手牵着手一起前进。我当时给学员上课的时候讲，你们经过培训后有三条发展的道路：一条是推荐上岗，择优入取。这个工作一定要客随主便，不管给公家做也好，给私人做也好，你一定要适应人家，你才能够得到不断的发展；第二自主创业，这是最能够体现自己价值的，但要承担风险；第三条路，把创业和团结合作、共同富裕结合在一起，这不是更好吗？大家在一起可以有一个相互依靠吗？而且你心中永远还有一个他人，不仅仅想着自己。现在我觉得，有许多学员都真的努力地在走这条路，因为她们有团结合作的精神，所以市场开发得特别快。

（到目前为止，成功的案例有多少？）

黄沙岛合作社已经有整整三年了，通河街道虽然刚刚成立才一年多，但它发展得很快。开头为了从外贸的私营企业那里弄一些加工的活，比如说羊毛衫袖口、领口翹边，(加工费)只有5毛钱或1元钱一件，收入少。当时这种活做得越多越好，但实际上收益是非常少的，我也组织人去拉这种生意。做到一定程度以后，我们觉得应该想想其它的办法，结果她们自己就设计做珠珠包，做好以后打出去，这个地方现在就变成礼品基地了。

（以前是为别人干，现在是自己创业开拓着干？）

哎。第三个是丹青制衣合作社，是“单亲”的谐音，但实际上是“单亲”，几个骨干都是单亲家庭，有的是离婚的，有的是丧偶的，有的是下岗的，她们几个人合

作起来做衣服，现在经常不断地有加工任务。这三个合作社做得比较成功，五角场本来有一个合作社，开始的时候也搞得很好的，都是残疾人。但是现在官方意志，街道主任为了自己的政绩，她想扶持一下，现在每个月给她五百元钱固定工资，让她做带头人，这样一来，反而起了离心作用，本来是团结合作、共同富裕，大家风雨同舟的，她个人拿了五百元以后，其他的姐妹们就离开她了。现在听说几百件都完不成了，以前做几千上万件的。但其他三个都很成功。我现在在校本部，民营企业支持的这个地方，准备做一个合作社，把所有以前经过培训业务好的人组织起来，再组织第四个合作社。自己投资做羊毛衫，准备自己进原料，编羊毛衫，羊毛衫上再刺绣，这样比那几个合作社都进一步了。我这里有几份材料。人家是过高地评价了我自己，我觉得自己没有那么高。但你看看吧。

( 你对大陆女性主义的发展是怎么分析、评价和展望的？ )

我觉得现在大陆女性主义的发展...我觉得在我经过实践以后，产生了一些片面的看法。从妇女系统来说，一直坚持“男女平等”基本国策的宣传，做了许多工作。但是，怎么从真正女性自我来激发她们的觉悟，自己去走一条自我解放的道路，自己去实践女性主义的道理，我总觉得还缺一截。我们的妇联组织总有一种天生不足的东西，它是从上面灌输下来比较多。

( 国际女性主义对你个人发展的影响是什么？你最早接触女性主义，听到这个概念是在什么时候？ )

就是在我自己受到很大的挫折，我自己有很大的压抑感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要重新奋起的时候。我那个时候在妇干校，有一次跟王政在一起，她们到妇干校



来讲了一点女性主义。我开始觉得，她们讲的比我们讲的男女平等的问题更有人情味，更有激发自我觉悟的意识。我后来为什么会成立这个组织呢？也是有影响的。还有就是“三个一万天”的理论，它绝对对我影响极大。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的。

（你在从事女性主义研究或行动的过程中，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）

我就感觉到有做不完的事，越做越多。

（你做得那么辛苦，做得那么累，有时候静下来的时候是不是会想：我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？）

我一点都不后悔。我从一个组织到两个组织。第一个组织现在已经发展到十几个省市，大家团结在一起。第二个组织就更不用说了，有一万多人的全免费都培训出来了，解决了多少人的问题。我总觉得很值得。当然，我也很累，我后来的老爱人（后来重新成家了），成家的时候，正好是90年。这也很有意思。我现在的先生是交通大学农学院的一个老教授，我俩同年，他也是丧偶。当时决定下来的时候，我提出了一个条件。我说：我现在已经到退休年龄了，但我永远也不会退休的。

（他当时有什么反馈给你呢？）

我说：我退休以后会有很多的事情要做，全国女性人才研究会要管，我要到全国各处跑。94年以后又办女子学院，还有妇联一摊工作，三摊事情，团团转，我只要做得动，我要一直做下去的。当时他答应我的。他退下来的时候，搞课题也搞了四、五年，当然他要受到某些限制，他想再申请课题的时候就没有依托了。现在他现在一方面把家管好，第二，帮我在内部做许许多多的事情。

( 他全力支持你做事情？ )

就是这样一个情况。当然，他有时候也会有怨言，毕竟这样已经十几年了，人到了将近七十岁了，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劳累了，感觉到一个人在家里有点孤独了，怨言也会有的。我说，等到我跑不动的时候就回家，就会全力陪你了，现在还能跑的时候，是工作性质决定的，我还得跑呀！不跑的话，就没有办法开展工作了。

( 你觉得你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失去是什么？ )

我从小没有家庭，童年丧母，中年丧夫，后来又重新组织家庭。原本如果在晚年有更好的天伦之乐的话，心里也是想的。但是，回过头来，如果孩子们也想享受天伦之乐，他们还能奋斗吗？我的一个孩子从大学到大学，在复旦大学读完研究生以后留校工作，还有一个孩子在读第二工业大学。但是现在社会的发展，他们也不能安于这个现状，因此，他们还需要另外去奋斗。他们自己去奋斗的话，有时候会自身难保的，我就说：你们奋斗你们的吧，我奋斗我的吧！我奋斗到八、九十岁，这点退休工资，总有口饭吃。

( 孩子不怨你吗？他们也爱你，会觉得妈妈太累了，也该歇歇了，母亲慢慢年纪大了，再这样劳累下去对你的健康是不利的。 )

第一，他们有没有能力做到来照顾我，没有，不可能。第二，如果我无所追求的话，我的理想的境界，比如说，现在我搞平民教育，这些困难的女性能够受到教育自强起来，我现在又把她们组织起来共同富裕，如果把这些理想都放弃的话，我感觉到自己就没有目标，就养老了；养老了，就没有目标了。怎么养老？怎么

渡过这一生？奋斗还是主要的。最理想的是，老的、小的，大家都一起奋斗，也都能够团结在一起，有亲情的话，是最好的。但是，在奋斗的同时，要想有亲情，是有矛盾的。

（这种矛盾，有时候你怎么克服呢？）

只能够在过年过节的时候，尽可能拉在一起聚一聚，其它就没有办法了。

（作为一个人的感受，你在办学、办学会和搞平民教育工作中，最大的困难是什么？）

经费上的困难当然是最大的，资金有来源的确是没有保障的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我还可以自己投入一点，但随着退休的时间越来越长，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低。刚开始退休的时候工资是 700 元，现在涨来涨去才 1000 元。当然我也得为老伴考虑一下，万一我和他真的病了，我要两个孩子来承担吗？因此，当然我现在还在继续地付出，但是，我毕竟不再会象刚开始的时候拿一万元钱投下去。因为我和老伴加在一起才两千块。但更大的困难还在于人们的理解，我常常会有一种寂寞感。就平民教育来说，到现在为止，能够志同道合在一起的只有陈英，没有第二个人。我刚开始搞平民教育的时候，包括象叶淑华这样高层次的人，她还是全国人大常委，她对我说：老王，你干什么要这样苦？你要解决困难群体的问题，连总理都解决不了，你去解决？我说：总理尽他总理的职能，他解决一国，我解决一角，星星之火，我只能保持这么一片绿洲，能做多大就算多大，能做多久就做多久。

我想我能够有一个闪光点，但这个闪光点能不能持久？我也很现实的，我能活几年，到了我真的走不动了，真的没有力气了，也许这个闪光点就灭了。但这

十年的历史总是埋不掉的.我不可能万岁的，如果有朝一日，有一个年轻人能够把它接过去，能象我这样做就最好，没有的话，也就算了。我心态是这样的：我准备从自己开始，也准备从自己结束。如果我真的病倒了，垮掉了，也只好放弃了。

( 据说你个人身体状况也不是太好？ )

也就是这个过程,这个十年，我是多发性肿瘤。

( 哪一年发现的？ )

75 年就动了第一刀，这里。然后就是 80 年，我以前爱人病的时候，是血管瘤，又开了一刀.接下来就是又成家后,就是 94 年，当时为了准备世妇会，身体非常累，为了世妇会和办贫民学校，两件事情在一起，人太累了，在 95 年的时候，乳房诊断出来不好。我这个人多病，体质很差，又很敏感.刀开得快，所以病没有多变，但一个乳房拿掉了。96 年甲状腺瘤。

( 一共开了四刀了？ )

哎。再加上我从小就得过肺病，我二姐因为肺病死的，她跟我差三、四岁，她死了，我没有死，一直到严重的气管炎。我又生过肝炎、胃窦炎，反正身上各个部件都有点问题。但我两个孩子也很理解，小儿子说：最主要是妈妈现在还在做一些事情，也就是精神的力量。我小孩对我爱人说：赵伯伯，你让妈妈忙吧！如果她不忙的话，也就没有气了。因此，他们也理解我。

( 象你这个年龄了，又是这样一个身体状况，你在女性主义的行动中还继续承担怎么样的角色？ )

我想接下来，如果今后妇联工作能脱身一点，首先妇联的工作要脱出来。

( 妇联现在是返聘你？ )

返聘我。到一定程度以后，我想要脱出来，要把更主要的精力集中在全国女性人才研究会和女子平民教育上。第二，我要尽全力，把我身边最能够理解我思想、能够默契配合的、志同道合的陈英，如果能把她培养得更好，我可能会超脱一点。

( 她现在是专职的？ )

是的。她原是第二工业大学的妇委会干部，她也退休了。

(她现在是专职吗?)

对。

( 你发工资给她吗？她是义工吗？ )

义工制，一个月 500 元，另外，再看任务的情况，如果特别繁忙的话，再加一点加班费。

( 陈英老师能够这么理解，跟你这么志同道合，是受你的影响，还是原本她就(非常热心妇女工作)... )

她心地比较好，她看见我多年来到处奔走以及这样的家庭、身体，她感觉到应该为社会干点事情。

( 你对自己的一生什么评价？ )

我一辈子始终是在有所压抑中追求，在奋进，这一辈子蛮苦蛮累的，但我的个人目标始终是朝着求个人的解放、姐妹的解放这条道路始终没有变，即使我做了很大的牺牲，包括我以前爱人的过世等等，这对我也有关系的。我始终工作工作，家里就顾不上。

( 社会上对女人不着家，不管家，社会上对女人的非议是很多的，你对这种来自社会的压力是怎么克服的？做好这方面的工作,你把精力都放在工作上.作为一个女人,不能照顾家庭,你对这种社会压力是怎么克服的？ )

不管是过去的家还是现在的家，我觉得是尽了最大的力的。过去的家，我养了两老两小，他家的老人没有工作.现在的家，我们俩的收入并不高，但我们老有所伴，我们都是患难夫妻。对家务来说，我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承担家务。当时孤家寡人的时候我白天上班晚上做家务.我认为一个人对国家、对民族、对家庭都要尽到自己的责任。

( 别人说你是中国的“何塞·玛丽亚”，你对这个怎么看？ )

这个人我不熟悉，这是人家给我戴上去的，我并不是学习她什么才这样做的，我根本不知道.别人给我写上去了，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。但是，她也好，我也好，无非是看到贫困.我最认不得人有贫富之差，最认不得不平等，男女不平等、人与人之间不平等也认不得。我始终认为“一人相遇，取足补欢”，人就要忧国忧民。为了这种理念，有时候觉得自己牺牲有很多也值得。我可能做了一部分的工作，帮助了一部分的人，如果这种理念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话，那就是一大片。